责编：沈辉 E-mail：zydxshenhui@2008.sina.com Tel:010-62806418

◆观 点

在利益纷争中呵护公平正义

今年的记者节，因为“陈永洲案”而变得沉重。事件本身的一波三折，以及舆论对此的众多纷争，都显现出当下媒体生态的尴尬与困境。

当警方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带走陈永洲，《新快报》在头版疾呼“请放人”“再请放人”时，很多的媒体同行都感到惊愕、诧异，甚至义愤填膺。而当陈永洲涉嫌收受金钱发表不实报道被披露后，舆论迅速出现分化，随后，对此事件的各种报道和评论，引发了更为激烈的论争。

在陈永洲被警方带走之初，我理解同行们的愤怒。当然，在没有掌握更多事实的情况下，这种愤怒可能过于冲动，或多或少带着主观偏见。毕竟，有过记者被打、被扣留的事件，有过因言获罪的异地抓捕，记者在调查报道中遇到的阻挠、困难甚至险境，让他们本能地对自身处境格外敏感，对可能出现的“侵害”备加警惕。而随着更多事实浮出水面，记者收钱、新闻寻租、媒体自律之类的关键词，引发了人们对新闻业界生态更多的思考。

媒体人早就不以“无冕之王”自居，他们更多地自嘲为“新闻民工”，因收视率、转载率之类的考评而焦虑，因发行量、广告额而忧心。那些铁肩担道义，批评、监督、揭露黑幕而带来的职业荣誉感不断减弱——当你在采访中被人“踢皮球”，甚至被打、被扣留，当你辛苦调查来的报道被“禁令”、被“公关”而不能刊发时，还有多少成就和自豪可言？

与此同时，失实报道、有偿新闻乃至敲诈勒索之类影响媒体声誉和公信力的行为，又让整个业界沦陷、蒙羞。当寻租成为一种潜规则和新闻特权，多少媒体人能独善其身？有学者提供了这样的信息：美国一项研究显示，在 66 国“有偿新闻”指数排名榜上，中国新闻界位居前列。当社会公器成为利益工具，还有多少媒体和新闻值得信赖？

这就是新闻界所面临的现状。

一方面，媒体的正常话语权受到限制，舆论监督在一些时候举步维艰。关于某个企业的“坏消息”，可以被企业用金钱摆平；关于某地政府的批评报道，可以被当地相关部门用权力禁止。当媒体正常的批评、监督遭遇“围追堵截”时，媒体人还有多少为民请命的自豪感？另一方面，金钱和权力，又造就了媒体的“非正常话语权”。只要给钱，就可以替某个企业大肆宣传，发表不实报道，打压竞争对手，甚至以“曝光”相要挟，获得红包、广告费；只要有权力，就可以抹平负面新闻，将坏事变好事，一路凯歌高唱。在金钱和权力的双重胁迫下，新闻所追求的客观真实不堪一击，一些媒体的自尊和公信力消失无踪。

作为媒体人，我了解现实舆论环境的不尽如人意，知道同行们在采访报道中的不易，懂得他们的艰难。同时，我也面临失实报道、新闻寻租所造成的媒体公信力下降的尴尬；感受钱权之下，媒体的抗争和沦陷。

但是，我们的社会，正是在这样的艰难抗争中向前。在众多人的职业困惑中，不乏执着的坚守者。就像收红包、开大处方、草菅人命受到滔滔指责的同时，总有尽心尽力、以高超医术救死扶伤的医生一样，在并不良好的环境和声誉中，总有秉承职业精神的记者和有良知的媒体，那些第一时间出现在灾难现场的身影，那些克服重重阻挠揭露事件真相的同行，那些冷静客观深入的新闻调查，会让我们受到鼓舞。

我们可以不谈理想，如果你觉得它很奢侈的话。我也知道，当金钱和权力无所不能时，改变媒体的处境，绝非行业自律那般简单。只是，一个职业，一个职业人，总应该坚守职业操守。外部环境的优劣，不该成为自律与否的标准，如果媒体人希望你所从事的职业有尊严，请守住底线，敬畏事实，在利益纷争中呵护公平正义。（2013 年 11 月 8 日《中国青年报》冯雪梅）

血性是制胜的基因

对于军队来说，血性关乎胜败。纵观历史，一支军队要想克敌制胜，不可没有雄风霸气；一名军人要想横刀立马，不能没有铁骨血性。这种敢于刺刀见红的“血性”，任何时候都是威敌慑胆的“法宝”。

习近平主席指出，和平时期，决不能把兵带娇气了，威武之师还得威武，军人还得有血性。这就要求军队一切工作都要以能打仗、打胜仗为目标，锻造一支外练筋骨皮、内练精气神的钢铁之师，培育一支充满血性、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威武之师。

自古以来，血性就被兵家所推崇，被誉为军人的脊梁、胜利的基因。我国古代兵法主张“合军聚众，务在激气”，“气实则斗，气夺则走”。孙武提出“夺气”“攻心”为上，左宗棠认为“打仗以胆气为贵”，刘伯承强调“狭路相逢勇者胜”。这股气，指的就是军人的血性。

激发战斗豪情，许多外国军事家都有着特殊的认识。克劳塞维茨说过：“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真正锋利的刀刃。”拿破仑也曾说过：“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利剑和精神，从长远说，精神总能征服利剑。”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我军更是彰显了特有的战斗血性。面对敌人的飞机大炮，我军官兵凭着敢打必胜的狠劲，披荆斩棘、视死如归，夺取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尤其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钢少气多”的志愿军战胜“钢多气少”的联合国军，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直到战争结束多年以后，许多参战的美国老兵说起来仍感到恐惧：“我们最怕与中共的军队交战，他们不仅善战，而且太不怕死了。”他们称这种不怕死的精神为“谜一样的东方精神”。

血性，永远是人民军队的红色基因。无论战争形态怎样变化，革命先辈植入军队骨子里的这股血性，必须一如既往地传承。但血性并非天性，不可能与生俱来、一蹴而就、永不消退。军人的血性表现在战时，培养却在平时。只有平时训练敢流血，战时打仗才能敢拼命。“敢流血”，就是对军人“血性”的直白表达，是一种由认知、情感、意志等因素凝结升华而成的精神力量。

“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阵之时，则忘其亲；击鼓之时，则忘其身。”到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丢了“闻战则喜、逢敌亮剑”的虎气、“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勇气、“平时忘我、战时忘死”的士气。这种战斗精神筑牢的是信念，坚定的是斗志，激励的是勇敢，成就的是打赢。（2013 年 11 月 10 日《人民日报》杜树人）

◆文 坛

当前文艺批评的问题所在

当前文艺批评的确面临让人不关心、不信赖、不想读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专业水准不够凸显，缺乏理论上的论述耐心；文风很成问题，没有体现出批评也是一种美文创作；分析能力不深入，就作品说作品，缺乏对作家创作的整体把握和宏观论述，所以对一个作家创作的整体把握常不到位，不能真正通过文章来说服读者，征服作家。既不能体现出彻底的学理性，又不能体现出艺术上的感悟能力，以及语言表达上的分析能力，批评文章的可读性就很难凸显。

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下，批评出现了两极分化。一方面，为满足宣传的要求，批评家也会写一些不指缺点的文章，被称之为吹捧；另一方面，媒体会刻意组织一些酷评，以反着说、偏激说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前者不可信，后者照样不可信。所以现在说“好”受质疑，说“不好”一样没人听，酷评也快消失了。切实加强文艺批评，应自上而下都把理论批评当成要务来抓。鼓励、理解应多于指责、失望。就批评家自身而言，要倡导好的批评风范。批评首先是一种专业阅读，欣赏是其前提，提出不足、局限是责任。应当提倡批评家与作家艺术家、与读者观众之间的对话式的批评态度，诤友式的批评风格。批评家应该不吝赞词，并应当审慎地提出不足与局限。一味追捧是歧途，一味追求尖锐，把“敢于直言”当成批评要务，同样会导致对批评的专业性要求降低，对说大话的能力和胆量的要求增加。“捧杀”和“棒喝”都非正途。中国古代文论的传统，都是教人如何去有标准地欣赏，而不是如何去捧人骂人。

对一些文艺现象，该批评的就要批评，但应以相对统一的对社会公众和艺术负责任的价值观作为前提。比如对《小时代》这样的作品，由于文化市场的需求，很多人愿意强调其如何“受欢迎”，但面对作品艺术性的不足、价值观的问题，许多批评家又另有别的说法。我们提倡百家争鸣，但没有相对吻合的艺术标准和价值要求，出现的只能是观点撕裂式的各说各话，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争鸣。

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批评，一家之言自难周全，需要大家共同讨论，努力寻找共识。（2013 年 11 月 11 日《文艺报》 闻言）

◆史海钩沉

“改革四君子”对话中南海

（一）

即使隔了 30 多年回头看，1978 年都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起点，那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但“百废待兴”的另一面现实是：被“文革”洗劫的国家财政赤字严重，经济面临崩盘。

被称为“改革四君子”的几个青年人就是在其间站到了历史的前台，他们给国家领导人分析社会经济动向，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可能的危机提出了预警，作为高层智囊参与了许多改革决策的重大事件。

“四君子”第一次面对中央领导人进行“老青对话”是在 1979 年底，当时，翁永曦 32 岁，王岐山 31 岁，黄江南 29 岁，年龄最小的朱嘉明 28 岁。

回忆起过去的岁月，现在成了“老黄”的黄江南感叹：“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出格的思想’都敢讲。”

1978 年，笔试分并不高的他凭借几篇讨论企业改革的论文，以及不错的口试成绩，被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破格录取。当时社科院研究生的水平有口皆碑，在全国高校院所中遥遥领先。黄江南的同班同学有朱嘉明、陈佳贵等，一共 19 人，大多在入学前都已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社会研究能力。

这批关心国家命运、又具备专业知识的学子会聚一堂，志同道合，相见恨晚。黄江南、朱嘉明以及李银河等十来个年轻人组织了一个“私密派对”，讨论各种学术问题，主要是经济和社会问题。当时研究生院还寄居在北京师范大学，他们常骑车到香山，将讨论与郊游结合到一起，兴之所至，还会翩翩起舞。

这些讨论原本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圈子里进行，后来黄江南认识了翁永曦，翁本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一个村子当大队书记，1979 年，经北京高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重新分配回到北京，在《农民日报》当记者。翁永曦交友广泛，黄江南希望他把一帮朋友也带到这个圈子里来，他们约了一个时间，在农民日报社开了一个“青年经济问题讨论会”。没有请帖，没有固定的参加者。那一天，他们在屋子里生着火，翁永曦买了瓜子之类的零食，三五十个人挤了满满一屋子，交流氛围非常热烈，趣味相投，意犹未尽，于是相约再组织第二次。

这个讨论会就像一个沙龙。第二次聚会也是一个星期天。他们没有跟学校打招呼，找个借口借用了一个临建板房教室。这一次与会者大概有上百人，很多人慕名而来。虽然有不少生面孔，但凭借着年轻人特有的精神头儿，他们“英雄不问出处，只较武功”，会议又很成功。

第三次讨论会的时候，研究生院已经无法容纳那么多人了。有人自告奋勇借来了北京市委党校的礼堂。最后礼堂都挤满了，连走廊上都是人，这次人数达到千人左右，至此讨论会名声远扬。

之后，由讨论会聚集到一起的年轻人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他们在民间纵论改革利弊，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社科院的学生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后来，国家收编这些“游击队”，国家体改委从发展组和其他一些半官方及民间研究组织中选了一些人组成团队，这正是体改所的缘起。

（二）

1979 年，全国又提出建设 10 个“大庆”、30 个“大化肥”，以及多少个“大钢厂”，又是一片“大干快上、大跃进”的局面。那时黄江南已经发现了计划经济必然不断经历“平衡—危机—再平衡”的发展规律。在一次聚会讨论中，他表示，国民经济的结构失调已经到了崩盘的边缘，不是要“大跃进”，而是到了采取危机对策的时候了。

李银河听完黄江南的分析非常着急，她说：“你的观点非常重要，避免国民经济危机是件大事，一定要让领导层知道，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叫王岐山。”李银河认识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的林春，林春认识王岐山。

王岐山当时在社科院近现代史研究所当助理研究员，虽然是学历史的，但异常聪明，吸收能力特别强，跟黄江南一谈就理解了他们的想法，马上表示赞同。于是，黄江南和翁永曦、朱嘉明，再加上王岐山，这四个人成了一个小小联合体。“经常在一起聚会，有时候在王岐山那儿，有时在我这儿，我这里的办公室大。”翁永曦回忆。

王岐山提议起草一个报告呈交中央，他们在北京市委党校后面的一间空房子里关了几天，写出了一份报告。他们预测 1980 年经济将要出现的衰退，分析衰退产生的原因，并给出了应对危机的对策。

当时国家计委每年的国民经济预测增长的数据都是 6%~8%，四个人在报告中的预测却是 1980 年农业将出现零增长，轻工业会出现负增长，重工业负增长幅度会更大一些。

王岐山把这份报告交给了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姚依林，姚依林看后觉得很重要，又转给了陈云。陈云在报告上批示说：“一个学工业的，一个学农业的，写了一份很好的报告……”其实，翁永曦不是学农业的，只不过在《农民日报》工作。

这份报告直达最高层，中央领导把黄江南一行找去，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听取他们的汇报，并一起讨论是否会出现经济衰退及应采取的对策。这就是 1979 年底第一次“老青对话”，除了高级领导人，参加会议的都是些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的干部。

黄江南自认“初生牛犊不怕虎，很狂”，负责报告的理论部分。向中央领导汇报时，这个年轻人阐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规律，并直言当前已经进入了继三年自然灾害那场经济危机后第二次经济危机爆发的关口。

翁永曦负责做最后总结，他用了八个短语：“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提出以调整为中心、休养生息的危机对策。

陈云将“舍发展”的“舍”改为“节”，后来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中正式引用。这个对话开创了很多个“第一次”。次年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出现了“国民经济潜在危机”的警告，这是国家第一次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经济危机。

那次给中央领导人“上课”后，王岐山、翁永曦、朱嘉明和黄江南继续在一起搞研究、写报告，关于生态的、农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谁有些什么想法，就拿出来一块儿讨论，讨论完之后，他们一起动手写文章，在报刊上联名发表，比如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对我国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的若干看法》。因为他们总是一起署名，一开始大家叫他们“四签名”，后来不知道谁改叫“四君子”，这个称呼就流传起来了。（2013 年第 8 期《学习博览》喻建欢）

◆视线

▲数月来，演出行业内很多公司直接倒闭关门的主要诱因是中央限制“三公消费”，但是，也从侧面提醒我们“千亿晚会市场依赖政府”的反常和悖谬。限制“三公消费”能击倒演出市场时，本身就意味着那种把利益攫取寄托在政府和官员身上的做法是多么的不靠谱。过去晚会行业根本就不是市场化竞争，它只比人脉、关系及权力大小。一些地方政府的领导好大喜功，好的说是借晚会造势，但也不排除个别人以晚会之名追明星、做交易，用纳税人的钱为自己谋利，崽卖爷田不心疼。而一些演出公司心照不宣，乐得“助人为乐”，各取所需，不仅搞乱了党风政风，而且搞乱了社会风气。中央加大反腐力度后致使很多演出公司倒闭，这是好事，符合老百姓的期待。（2013 年 11 月 3 日《现代快报》朱四倍）

▲行政收费涉及对民间资源的汲取，最终的正当性存在于人民的同意。只有公民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授予行政机关收费的范围、标准、程序、使用等等，才能从根本上遏制政府收费的冲动。因此，要将社会抚养费征收彻底纳入法治轨道，就必须加快制定统一的行政收费法，以确保社会抚养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2013 年 11 月 3 日《京华时报》傅达林）

▲城市化要有一定限度的移动自由，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趋势难以阻挡，但目前人口配套制度建设严重落后。目前中国城市化率相对落后，工业化率相对超前，服务业发展不足。相信未来还会有新一轮再城镇化，对现行城镇化不合理部分进行重组。（2013 年 11 月 4 日《中国证券报》周其仁）

▲潜在增长率的讨论中一个认识误区，是潜在增长率下降被看成是必然趋势。其实潜在增长率是动态的，就中国而言，未来有些因素是向下拉的，但也可以通过政策变量提高未来潜在增长率，例如更充分地转移劳动力，激励企业加强员工在职培训。仅简政放权的实施就能大幅提高企业社会的效率，抵消人口变化的拉低效应。（2013 年 11 月 5 日《新京报》屈宏斌）

◆纵 横

热狗外交

在外交舞台上，每一个姿态、每一个细节，往往都被视为深谋远虑、机关算尽之举，当中饶有深意。因此，为了避免被人错误解读，在外交场合，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往往都会十分谨慎。偏偏美国——这个欧洲王室眼中的化外之地，做起事来却粗枝大叶，“拿肉麻当有趣”，往往让那些“蓝血之士”侧目。

例如，当有贵客自远方来，主人总该摆出场面盛大、名菜云集的国宴来款待，以示尊重。偏偏美国有时反其道而行，以棒球、烧烤等寻常百姓家之物来款待贵宾，让后者哭笑不得。这些还算靠谱，更离谱的是——以热狗来宴请锦衣玉食的一国之君！

这个让不少王室匪夷所思的美国外交传统，起源于 1939 年 6 月，主角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王乔治六世。彼时正是二战前夕，欧洲战云密布，英国大敌当前，为获取美国支持，乔治六世（对，就是那个出了名的口吃国君，《国王的演讲》一片的主人公）毅然远渡重洋，飞往新大陆，希望能与美国结盟。

这种英美官方交谊如今或许不以为异，但在当时，两国仍未完全摆脱独立战争所留下的心理阴影，关系敏感而脆弱。因此，这次乔治六世的美国之旅，是在心里没底的情况下启行的。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官方访问结束后，罗斯福安排英王伉俪到其乡郊大宅欢度周末，为了显示亲善，更为了在一个较为轻松的环境下打开心扉说话。

堂堂一国之君，平时锦衣玉食，忽然走进乡郊大宅，只觉浑身不自在，再加上前述两国间的芥蒂，更让他心存阴影，猜测主人是否故意怠慢，向他这个低声下气、有求于人的前殖民地宗主国国君还以颜色。

英王伉俪后来更发现，主人竟打算以一次露天野餐来款待他们，助兴的不是管弦乐队，而是一些印第安人表演的山歌。更糟的是食物，没有山珍海味，只有火腿、果冻、蔬菜沙拉、苏打水、啤酒等。这也罢了，主食竟然是热狗！没错，是热狗！两人心里估计是七上八下，猜测主人是故意要让他俩丢脸。

王室向来雍容华贵、举止优雅，偏偏热狗吃起来食相难看，所以这对他们来说好生为难。大家都知道，女士吃热狗，食相实在是尴尬，更何况是身份尊贵的王后。于是伊丽莎白不好意思地问罗斯福，热狗可以用什么方法吃。不料，罗斯福却粗豪地说：“十分简单，就把它往口中送，一直往口中送，直至把它干掉。”结果，英王还是放下矜持，将热狗吃掉，吃得津津有味，还要了第二只。王后又如何？她拿着刀叉干掉了那一只热狗。

翌日，《纽约时报》在头版报道了这“惊世”一幕，美国民众对此反应甚好，认为英国王室随和亲切，能够放下身段，向他们这些“化外之民”看齐，一起品尝热狗这味“国食”。

后来，英美两国果然在二战期间缔结了军事同盟，共同对抗纳粹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法西斯。

这个有趣的故事，后在电影《当总统遇见皇上》一片中被再现。

顺便提一句，71 年之后，2010 年 6 月，奥巴马与来访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会谈，你猜这位美国总统是如何设宴招待来宾的？答案不是豪华酒店、米其林餐厅，而是一家叫作 Ray's Hell 的平民汉堡店。

奥巴马点了一个汉堡包，加上车打芝士、洋葱、西红柿、莴苣、腌黄瓜以及一瓶红茶；梅德韦杰夫也点了一个汉堡包，再加上车打芝士、洋葱、蘑菇、墨西哥辣椒以及一瓶可乐。两人还分享了一份薯条。两位总统都脱去西装外套，身着白色的衬衫。奥巴马习惯性地卷起袖子，摆出一副大快朵颐的样子；梅德韦杰夫则保持了俄国绅士的风度，没有卷起袖子。两人相向而坐，一边啃汉堡，一边借助旁边的翻译谈笑。最后由奥巴马“慷慨”结账。

美国人是否有点让人哭笑不得呢？（2013 年第 21 期《读者》蔡子强）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邮政编码：100091 社长兼总编辑：谢春涛 常务副总编辑：钟国兴 广告部电话：62805980 62806380 发行部电话：62806227 兼传真 总编室电话：62805368 62806234 电子信箱：xuexishibao@126.com
定价：全年 180 元 邮发代号：1—267 国外发行代号：W3970 开户银行：建行北京中关村分行 户名：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 账号：261300045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海工商广字 0301 号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